

1939~ 1940 年知识界关于 “宪政与抗战”的讨论及其价值体现

李翠艳

内容提要 抗战全面爆发两年后,国统区发生了第一次宪政运动的浪潮。关注中国命运的知识界站在这个潮头,应时开展了关于宪政与抗战的讨论,想借此引起民众对宪政的认识,并将宪政的理论转化为救亡图存的工具。本文对这一讨论过程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客观评价了正、反两类观点,同时对这次讨论的价值体现作了分析。

关键词 抗战时期 知识界 宪政 抗战

宪政是追求进步的国家和社会的一个永恒话题。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内知识界,包括国共两党、其它党派和无党派知识分子,出于对民族危亡的关注,将西方的宪政理念引入中国,在中国本土展开讨论,试图将宪政本身的理论转换为救亡图存的工具。于是,在1939年9月开始的第一次宪政运动期间,展开了关于“宪政与抗战”的讨论。这次讨论历时四五个月,几乎波及全国,各方面刊物如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的《新政治》半月刊、共产党的《新中华报》、爱国人士主办的《全民抗战》、大型理论刊物《东方杂志》、香港《大公报》等纷纷发表文章或发行宪政专号参与讨论。这次知识界的大讨论,在国民中普及了宪政理念,推动宪政运动的更广更深发展,在思想理论上为转变抗战时期的政治格局,乃至奠定抗战建国的政治基础,发挥了重要的舆论促进作用。近年来许多研究宪政

的学者关注的是宪政运动本身的情况,并且以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势力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对这次讨论的具体论述关注不多。笔者以为,这次讨论相对于研究较多的“民主与独裁”的讨论,更加具有时代特色,其研究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超过对宪政运动本身的研究。因此不揣冒昧,对这次讨论的过程及其价值进行初步阐述,以就教于学界同人。

—

根据西方政治学理论,大凡在战争爆发等危机时期,中央应采取集权政制,限制或部分限制人民民主权利。面对日本不断的军事侵略,中国的宪政又该何去何从?早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一些学者便提出:非常时期应以国家大局为重,为了全力抵御侵略,国民政府应采取中央集权制。另一些学者不认同此种论调,阐述了实行民主政治的种种优势。这种争论在1934、1935年演变为“民主与独裁”的讨论,这个讨论以北大、清华等政治学者为主发起,主要论文集中在《独立评论》发表。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前,又较为集中的进行了一场关于政制改革的讨论,此次讨论不再争论民主与独裁的优劣问题,而提出一个理想政制的蓝本——宪政,主要涉及西方宪政是否适应当前中国环境、宪政实施需要什么条件、怎样进行宪政准备等问题。关于政制改革的讨论可以看作是关于民主与独裁讨论的延伸,因为它是在承认民主优于独裁的前提下,对民主政制(宪政)进行深层次理论阐释。这两次讨论引进了西方民主政治思想,使宪政理念在国内广泛传播,表达了中国知识界努力追随世界政治发展潮流的愿望。

实际上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国内知识界便针对宪政问题,展开过相当的讨论。关注国家命运的学人,此时已经敏锐地提出实行

宪政不仅是先进的政治发展方向,而且对于抗战有着重要的意义。《申报》就此发表社评:“国难至此,存亡之机,间不容发,固已不必待人民之要求,当自动停止训政,实行宪政,公开政治,使人民得以参与政治与共赴国难之机会。”^①陈莫干指责国民党的党治,提倡民治,他认为:“党治不但不能完成宪政,促进民治,党治制度之推行,反足为民治之莫大障碍。”^②这体现了知识分子对宪政的渴求。朱采真更是单刀直入,矛头直指国民党政府,认为实施宪政是在抗战时期进行政治救国的“一条和平捷径”,“国民党不交还中央统治与人民,则人民无从团结其救国之力量,亦无从发挥抗日之精神”。^③类似如此的言论散见于各种报刊,主要是敦促政府早日实施宪政,以便团结抗战。反对的观点相对来说倒是不多见。这与五四以来所形成的民主潮流在国内的影响不无关系,也反映了战争环境下民族利益在国民心目中的重要位置。

抗战全面爆发以后,群情激奋,各方各界纷纷通电表示坚决抗战,不作亡国奴。各党派的力量在抗日的旗帜下不断壮大,国内政治局势呈多元发展。国民党不得不重视这种潮流,作出愿意实行宪政的姿态,1938年6月召集国民参政会,为各界提供一个参政议政的场所。对于参政会的成立,各界表示热烈拥护。汉口《大公报》发表社评,称国民参政会的诞生至少有三种重要意义:“(一)在艰难而长期的抗战中,中国的政治一步步走上健全进步的程途。(二)告诉全世界的友人,中国国家是统一的,中华民族是团结的。(三)向我们的敌人(日本军阀)示威:它的武力无用,中国越打越强;它的挑拨离间无用,中华民族越结越坚。”因此,“此会之运用,

① 《正告二中全会》,《申报》1932年4月5日。

② 陈莫干:《论党治阻碍民治》,《民治评论》第45期合刊,1932年7月2日。

③ 朱采真:《政治救国之一条和平捷径》,《时事新报》1932年1月18日。

不但可以巩固抗战时期的团结,且足表示战后政治的归趋”。^①中共也表示:“这一战时相当代表民意机关的产生,的确是政治上一个进步的现象”^②,同时,“我国抗战正进到严重的紧急关头,国民参政会的召集,可能而且应该在争取抗战胜利问题上起着重要作用。”^③以国民参政会为契机,知识界得以发挥其理论优势,参与抗战救国的讨论,他们对宪政和抗战的光明前途充满信心。国民党出于种种政治考虑,在参政会中也安置了本党知识分子和政客,并且由蒋介石亲任议长,试图操纵参政会的舆论走向,以遏制其他势力的增长态势。但潮流不可逆转,1939年9月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大会根据多数意见通过“请政府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实施宪政案”,抗战中的第一次宪政运动由此展开。知识界从此看到了中国的希望,热情洋溢地参与进来,纷纷在各大报刊发表文章,探讨宪政问题。这种潮流在国内抗战的背景下,首先触发的是关于“宪政与抗战”的讨论。这次讨论实际上承接了对西方在战时集权的争议,从理论和实践上论述了战时民主在当时中国的重要意义。

二

在宪政与抗战的讨论中,不同知识背景的学者所持观点大致分为两方面,即:支持抗战时期实施宪政的(下文称为正派);模糊和反对抗战时期实施宪政的(下文称为反派)。前者从不同角度分析宪政与抗战的密切联系,坚持尽快实施宪政。后者也为其反对抗战时实施宪政提供了种种论据。

① 《国民参政会的诞生》,汉口《大公报》1938年6月18日。

② 《国民参政会产生》,《新华日报》1938年6月17日。

③ 《人民对于参政会的希望和责任》,《新华日报》1938年6月29日。

反派的观点:

(一) 战争与宪政不相容, 宪政不能适应战时需要, 只有在和平时期才能实行宪政。

政治建设编辑姚宝贤借用《孙文学说》中的话说明自己的论点:“凡参加战争之国(指上次世界大战而言), 无论共和民主, 一律禁止宪政。向来人民之行动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 皆剥夺之, 甚至饮食营业皆归政府支配, 而举国无有异议……人之已行宪政, 犹且停之, 况我宪政尚未发生, 方欲由革命之战争于求之, 岂可于开战之初, 即施行宪政耶?”他认为在抗战中国民参政会通过实行宪政一案,“最大的旨趣似注重于‘期成’和‘准备’”, 并没有明确提出要马上实施宪政。在此争取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全国同胞唯一的希望是“打胜仗”, 在炮火中浴血的军民, 在流亡中挣扎的同胞, 他们是天天在热盼着军事胜利。“军事第一, 胜利第一”, 是广大民众真正的要求”, 而“对于宪政的需要当不致过分的切迫”。同时, 在战争环境下推行宪政有着种种实际困难,“无法实现那些办理登记、投票及种种完美的实施宪政的准备工作”。因此抗战期间宪政“决不是轻易实施的时候”, 在此时侈谈宪政,“至少是不能把握现实的隔靴搔痒之谈”, 没有多大的意义。^①这一论调在当时有一定的代表性, 它以战争与宪政相矛盾的理论为立足点, 说明抗战中不适于实行宪政。正派方面许多论证都以此为批驳的靶子。

(二) 抗战中没有实施宪政的必要, 宪政对抗战有害无利。

在抗战中根本没有必要实行宪政, 因为各党派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虽然有所出入, 但没有根本原则的歧异。这个时候实行宪政, 会使国民集中于对外问题的精力, 分散于对内事务, 从而对抗

① 姚宝贤:《宪政工作与战时实施宪政问题》,《新政治》第3卷第3期(宪政专号), 1940年1月1日。

战造成不利影响。《读书通讯》半月刊主编杨玉清提出：在烽火连天的战时讨论宪政问题，是中国的“一个大不幸”。他认为：“在目前实施宪政与否的问题，不是一个是非的问题，而是一个利害的问题。”也就是说，现在实施宪政不但不可以，而且对国家有害无利。他试图将“宪政与抗战”的问题引导至“政府改革与抗战”的问题，提倡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政府进行一些适应战时需要的改革，而国人应该在政府的领导下，致力于“要政府的行动法律化；要政府的设施制度化；要政府的体制民主化”，这才是“宪政的精髓”，“比实施宪政还重要”。^①很明显，他主张对政府进行局部的改革，以适应抗战需要，而不是用实行宪政来破坏现在的抗战局势。

（三）抗战时期实施宪政的条件尚未具备，可以进行建造宪政基础的工作，抗战胜利后才能实施宪政。

实施宪政起码要存在一个独立的国家，使民众养成守法习惯，完成地方自治，按照一定步骤进行。而在战时这些都达不到，不能实施宪政。吴泽炎在《东方杂志》撰文，承认宪政在理论上是无可非议的，但宪政实施的先决条件是存在一个可以实施宪政的国家，“任何良好的主义或理想的原则，都不能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我国的宪政运动，如果不至于成为闭门造车，那么也就不得不同时考虑到目前国家所处的环境，和国家目前最切的需要。任何主张中国走上宪政常轨的人都不能否认，实行宪政的先决条件，必须先有一个可以实施宪政的国家，如果国家亡了，宪政一事根本就无从谈起。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是一种无待费解便可明白的常识”。他在提出这一观点后又作了说明，称自己本意“并不是想把抗战与宪政截分成为不相干的两截；也不是说，在抗战期间，宪政问题就应该置之高阁，一待前线战罢，胜利获得，然后再制礼作乐，广开议

^① 杨玉清：《宪政问题与中国》，《新政治》第3卷第3期（宪政专号），1940年1月1日。

会,共享郅治。相反,国家原是一个有机体,抗战建国原是中国现代化程序的两方面,为适应当前需要起见,两者也许不免有所偏重,但决不是程序上有先后之别。即使在战时,宪政的基础功夫,仍旧可以进行不辍,事实上宪政运动能够多推进一步,政治便愈近于常轨一步,而国内政治愈能近于常轨,则直接间接当然会影响到国力的增强,而使抗战的前途更加光明”。他认为在抗战时期应该把坚持抗战放在第一位,同时兼顾宪政基础的建造。从这段说明文字分析,他并不否认宪政与抗战的紧密联系,仍然承认宪政的推进会对抗战产生有利影响。前后两段文字似乎让人费解,不明白作者的立场是什么。但他在这篇文章临近结束时写了一段话:“所谓宪政运动,实际上就是法治的实现”,“少谈民主,多讲守法,这是对国家宪政运动的最大贡献;也就是在抗战期中最应加紧推动的实现宪政的基本功夫”。“在强邻压境的严重情势之下,只有一心一德,在政府领导之下,为救国而作最大的努力,便不应轻言政权的转移;更不应再巧立名目,要求政府那样,使政府不能专心一意的获取胜利的战果。要知根本宪政并不是万能的东西。今日好多宣传小册子,力说宪政一旦实现,国家才能得救,好象只要一有议会,国家的困难便可解决,人民便可以自动奋起,壮丁便可源源而来,国家的府库便可充实,战费便可不虞竭涸,政治便可清明,贪污便可绝迹,胜利便可实现。”^①由此看来,作者强调遵守国民政府的法律,是实现宪政的基本功夫,是抗战的第一要务。施建生基本同意吴泽炎的观点,他认为战争是不能阻挡政治民主化的进程的,“战争只是政治的继续,我们今日战争也不过是为了要达到民族独立解放的政治目的。所以宪政与抗战是不相矛盾的。我希望在抗战的艰辛过程中,能树立坚强的宪政的基础。那么,等到抗战胜

^① 吴泽炎:《抗战期中的宪政运动》,《东方杂志》第37卷第2号,1940年1月16日。

利之日,也就是中国的宪政运动成功的一天了”。^①

相对于吴、施两位较为模棱两可的论述,以下学者则更为鲜明地提出抗战胜利后才能实施宪政的观点。专门研究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的政治学者、商务日报总编辑林桂圃认为,现阶段要实现名副其实的宪政,其前提条件之一是“必须完成抗战的大业”,“如果此次抗战万一失败,则国家已被人灭亡,那时还谈什么宪政?所以真正的宪政,必须在抗战大业完成之后,才能彻底的实现”。离开这个前提去谈宪政,便是虚伪的、名实不符的宪政。^②曾留学日本和巴黎的年轻宪法学者林纪东列举出主张在抗战时期实行宪政的六种理由,并一一进行批驳,认为“主张实行宪政的六个理由,没有一个是站得住,经得起讨论的”。进而明确提出:“我们反对在目前实施宪政,但我们赞成加紧宪政的准备,俾抗战胜利之日,建国工作亦即时观成。”^③另一位法律学者陆东亚则提出宪法生效的严肃性问题,认为宪政应该实行,但实行期限应有伸缩性,“在此时期,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一切权力,均应集中于政府,人民权利自由,当然受到限制。且抗战军事,何时结束,不得而知,与其肯定的规定在最近期间中实施宪政,而事实上又不能实行,反而减轻宪法之尊严,不若规定在抗战胜利后若干年实行为妥当”。^④

在宪政与抗战的讨论中,反派的观点大致如上述几种,另有一些以地方自治尚未完成、人民守法习惯尚未养成、不能有违孙中山先生建国程序等为由,提出宪政不能在抗战中实施的,因在下文正

① 施建生:《中国宪政运动之回顾与前瞻》,《东方杂志》第37卷第5号,1940年3月1日。

② 林桂圃:《我们需要名符其实的宪政》,《新政治》第3卷第3期(宪政专号),1940年1月1日。

③ 林纪东:《实施宪政问题》,《新政治》第3卷第3期(宪政专号),1940年1月1日。

④ 陆东亚:《论实施宪政问题》,《新政治》第3卷第3期(宪政专号),1940年1月1日。

派的论述中有所体现,因此这里不再赘述。

三

报界名人、救国会的邹韬奋在《全民抗战》第96号发表文章,作了这样的表态:“在宪政运动正须开展的时候,对于有关宪政运动的种种疑问,作虚心的讨论是有必要的。”^①正如邹韬奋一样,许多支持抗战时实行宪政的学者以共同探讨的态度加入到这个讨论中,提出更为充足的理由证明自己的论点。

正派的观点:

(一) 宪政与抗战密切相关,实施宪政正是要加强抗战的力量。

论者主要从实施宪政可以强固国本,加强抗战民众动员,巩固团结,保障民族利益等方面进行论证。邹韬奋提出:“实施宪政是加速促成抗战胜利建国成功的一个重要步骤。”他认为实施宪政,扩大国民的政治参与,提高国民对于政治的自觉与责任,就是加强国民对于抗战建国的共同努力,就是加强民众的切实动员。所以“实施宪政在常态的政治上固有着它的重要地位,而在这争取抗战胜利建国成功的伟大时期,尤其有着它的重要的效用”。^②邹韬奋引用了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的闭幕词,利用政治权威的力量阐发实施宪政可以“贯彻其绝对必要之作战目的”,是“加强国本,为最要之务”(蒋介石语)。随后从抗战的本质加以分析,他说,由于神圣抗战是采取持久战的策略,是要在抗战的过程中努力进步,愈战愈强,由防御而进步到确能相持,阻敌进展,再由确能相

^① 韬奋:《关于宪政的种种疑问》,《全民抗战》第96号。

^② 邹韬奋:《今年国庆与推动实施宪政的努力》,《韬奋全集》(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5页。

持而进步到整个反攻,驱逐或歼灭敌人,收复失地,恢复国土主权的完整。因此,抗战“对敌是有着‘破坏’性,对己却含有‘建设’性”,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宪政与抗战有密切的关系,以宪政来提高民权,才能加强抗战力量与加速抗战胜利。^①《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从民众动员的角度阐述了这个观点,强调“抗战需要宪政,因为抗战要能坚持,要能取得最后胜利,必须依靠民众”。具体来说,抗战需要把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智力统统动员起来,准备起足够的力量,对敌进行反攻。怎样动员呢?“这就需要实行宪政,把政制更加健全起来”。他从役政、肃清汉奸、铲除贪污等方面解释了动员民众的重要性,最后提出:“实行宪政是使全国人民活跃起来、动员起来的政治条件,是在政制上使全国人民的各种力量真能为抗战服务而动员起来的一种保障。”^②国民党参政员褚辅成也提出抗战中实行宪政有利于动员人民的力量,“因为抗战是全体人民的事”,“只有人民参加了政治,人民的力量才能彻底动员,最后胜利才有把握”。新闻记者范长江持有类似观点,认为“在抗战时期实行宪政是增强抗战力量,不这样,做不到动员全民力量,争取最后胜利”。^③英国伦敦大学博士、国民参政员程希孟进一步提到团结问题,他认为,抗战建国的中心是全国人民的团结问题,只有加强团结才能增强抗战力量,而“今天的要求宪政,其目的也不过是在使国内团结更上一步,走入更高阶段”。^④西北联合大学女教授韩幽桐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角度,提出宪政是抗战的保障,

① 韬奋:《关于宪政的种种疑问》,《全民抗战》第96号。

② 潘梓年:《宪政运动与抗战建国》,《理论与现实》第3期。

③ 梁明:《宪政和抗战建国的关系——宪政问题座谈会第二次讨论纪要》,《全民抗战》第94号,1939年10月28日。

④ 梁明:《宪政和抗战建国的关系——宪政问题座谈会第二次讨论纪要》,《全民抗战》第94号,1939年10月28日。

“只要战争自身不是违反民意的战争,不是破坏民众利益的战争,则实行宪政,对于这种战争,只有裨益,毫无妨害,特别对于反侵略的、正义的、民族解放战争,是这样。这种战争,需要宪政做它的保障”,因为“必须民主,才能集中人力,共御外侮”,同时“给予个人以自由权利,当不妨碍国家的御侮行动,和民族的整个利益。恰恰相反,倒是帮助国家自卫战争的胜利和保障整个民族利益安全的”。她反驳了战时应停止宪政的言论,提出:抗战是全民族的解放战争,应给予人民参加政治的民主权利,“使每个人都能尽量拿出他的力量,贡献给国家,用在这种战争上”,这和宪政没有任何对立、矛盾和不相容。^① 国社党参政员、曾任《时事新报》总编的张君勱从宪法的制定论证这个问题,他说,制定宪法,实施宪政,与平时或战时没什么关系,“平时有更好,战时需要时才有,亦无不可,完全以需要与否而定”。中国情况不同于欧美,平时意见分歧很多,而到战时,抗战国策是全国同意的,“可见有宪法,正所以增进举国一致,而不至引起意见分歧”,“要是按着宪法规定的条文做去,不但不分散抗战的力量,反而可以集中抗战的力量”。^② 人权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罗隆基,以坚决的姿态肯定宪政对抗战的效用,他说,宪政并没有什么神秘,其用意就在于“团结人心,集中力量”,要让老百姓心甘情愿出钱出命打赢日本,要让国家在对外作战中发挥整个国力,“要建设一个新的现代式的国家,且须在抗战期中奠定这新的现代式国家的基础”,“试问,到此有人怀疑宪政在抗战上的效用吗”?之后,他又从宪政在中国能否成功、法治与人治的辨证关系、宪法与国民大会问题等方面进行论述,主张“实施宪政应立

① 韩幽桐:《战争与宪政》,《全民抗战》第100号。

② 香港《大公报》,1939年11月29日。

即实现”。^①

(二) 宪政是民众化的民主运动, 是抗战时期的迫切需要。

邹韬奋撰写长文《宪政与民主》, 从民主的角度说明抗战需要宪政。他首先从西方国家宪政发展史来阐述宪政与民主的联系, 认为“宪政的发展和民主的发展是朝着同一的倾向”, “宪政的进步和民主的进步是成正比例的; 愈进步的宪政, 所包含的民主的内容也愈多愈丰富”。根据孙中山先生的遗教, 中国所应实行的宪政必须是进步的民主的宪政。同时从国民党一大宣言中看出, 孙中山主张的民主政治, 不但含有反封建的意义, 还含有反帝意味。因此, “实施宪政这件事在抗战建国这样紧急的时期提出, 有它的时代的急迫需要性, 因为真正民主的宪政是动员广大民众的基础, 是唤起民众共同奋斗的重要条件”。抗战的持久性, 决定了必须加速整个国力的增强, 而“切实执行民主的宪政, 却是更广大更彻底动员民众来加强国力的锁钥”。最后作者再次强调: “民主的宪政不但不是与抗战不相干, 而且正是抗战到了这样重要关头的时期所迫切需要的。”^② 赵冬垠认为, “少数反对政治民主化的人实在找不到别的理由反对目前的宪政运动, 他们唯一的理由就是战争与民主政治不相容, 民主政治不能适应战时的需要”, 因此“目前中国一切民主主义者的迫切任务就是要从政治科学的理论上, 从历史经验上来击破反民主主义者的这一论点, 向朝野上下说明正是为了支持抗战, 政治的民主化是异常必需的, 没有政治上这一伟大的进步, 抗战的最后胜利, 是难以想像的”。他将政治民主化等同于宪政, 强调政治在战争中的重要性: 战争为政治所领导, 单靠坚甲利兵是决不能战胜敌人的。当前政治的关键不是政治机构是否灵

① 罗隆基:《期成宪政的我见》,《今日评论》第2卷第22期。

② 韬奋:《宪政与民主》,《理论与现实》第3期。

敏、有效率，“怎样加以各党派的团结，怎样发动广大民众的潜在的力量，怎样巩固各阶级的合作，这在抗战的现阶段上都是目前中国政治的中心问题，这些问题显然决不是行政机构上的问题，而是方针、政策方面的问题”。随后他进一步指出：“说政治的关键是在于方针政策等等，不如说是在于政权的性质。”中国的抗日战争要想取得彻底的胜利，就应该实施进步的方针政策，就应该有一个能够实施这些方针政策的政权，因为“团结力量于政权之中来进行战争确是一个千古不移的真理”，因此“政权的巩固，政权的性质，对于抗战的胜利是具有决定的意义的。”^① 赵冬垠由战争说到政治，由政治说到政权，又从政权回到抗战，其中心就在于论述实施宪政对于抗战的重要意义。《华商晚报》主笔张友渔针对以地方自治尚未完成为由，认为无法实施宪政的论点，进行尖锐批驳，称：如果必欲完成地方自治，再实施宪政，“则恐怕抗战胜利，不能保障，地方自治也永无完成之日！”^② 他认为在抗战时期宪政运动的特质是：“一，它是和抗战分不开的。因为实行宪政，原是为了帮助抗战胜利，而巩固宪政，则又有赖于抗战的胜利；也就是说，民主政治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之手段，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则又为民主政治的最后保障。二，它是政府和民众打成一片的运动。因为实施宪政，既为政府和民众的共同要求，则宪政运动，自亦为政府和民众的共同行动。”根据这种特质，他坚持认为“实施宪政，则为目前抗战上的急迫需要”。^③

（三）宪政是建国的一部分，应迅速实施宪政，以抗战促进建国，并以建国帮助抗战。

① 赵冬垠：《论宪政》，《理论与现实》第3期。

② 张友渔：《国民党与宪政运动》，《全民抗战》第94号，1939年10月28日。

③ 张友渔：《中国宪政运动之史的发展》，《中苏文化》第5卷第1期，1940年1月1日。

留美法学硕士、广西大学教授、《宪政》主编张志让从抗战建国同时并行的角度展开论述,他认为抗战的目标很明确,就是驱逐日寇,收复失地。而建国的目标则是建设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义国家,这就需要“使政治达到民权主义的最终目的,就是实行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就是宪政”。因此他强调:“要使建国早日成功,要使建国真能帮助抗战,促进抗战的胜利,必须,迅速实施宪政。”此其一。其二,抗战进入更艰苦的阶段,而政府的政治落于军事之后,“推动政治前进的需要实在比以前更为急迫”,同时“要巩固统一团结,加强民族力量”,“实施宪政到了现在已属不容再缓”。另外,他指出抗战两年多政府动员了军队二三百多万,而始终未能很好地动员民众,从而使民众置身事外,对政治不发生兴趣,从而对抗战也就不发生兴趣,更不要提全民抗战了。因此“实施宪政也不应再有迟延”。此其三。全国统一团结是抗战胜利的必要条件,也是建国的必经之路。所以“为了要巩固统一团结,加强民族力量,我们也必须迅速实施宪政”。此其四。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是国家大计,容不得汉奸等鱼目混珠(针对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伪国大一事),为正视听也应迅速实行宪政。此其五。以上五点,都是建设国家需要做的事情,也是帮助抗战胜利的重要条件。最后张志让力陈争取时间实行宪政的重要性,“抗战需要宪政,犹如大旱需要天雨,迟得到一天,就多受一天损失”。^① 张志让还注意到国家发展的长远目标,提出“宪法的制定和宪政的实行是最容易因为拖延而致无结果的,所以尤其应该注意到争取时间的必要。宪法的早成和宪政的早行重于它们的完美,因为宪法制成之后,还可以依照它所定的程序加以修正,宪政实行之后更可以随时加以改

^① 张志让:《当前的宪政运动》,《建设研究》第2卷第3期。

善”。^①褚辅成强调要从事实上认识宪政与抗战的关系,中国抗战前还未进入宪政时期,由国民党代表人民行使政权,但抗战以后,集中各方意见成为必要,于是国民参政会成立了,这是建国大业中民意机关的初步模型,“好比是要造房子,先造成了模型,但随着抗战发展,单是模型是不够的,有了模型而要求更进一步来建筑房子,是非常自然的发展”。^②他巧妙地将宪政——建国——抗战联系在一起,以建设民主国家的目标来阐发宪政在抗战时期的实施。曾任香港《大公报》主编、救国会参政员张申府则提出从“认识方法要合乎逻辑”来考虑,抗战建国应该同时并进,“所谓建国,除经济建设、心理建设之外,还要有政治建设,它的具体内容就是宪政”。如果“把许多具体的设施都拿开,所谓建国还有内容吗?”^③《全民抗战》主编柳湜更是对宪政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他说:“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给了全民族国家无限的前途,也同时给了中国宪政运动新的内容,新的发展条件”。“决定中国政治趋向民主开步走,并且不断前进的是中国的抗战。”^④

(四) 抗战正是实施宪政的好时机,应努力促成宪政。

赵冬垠在《论当前的宪政运动》和《论宪政》中,不但从政治科学的角度反驳了“战争与宪政不相容”论,还进一步提出抗战是实施宪政的良好时机的论点,他说:抗战时期的民族统一战线比国民革命时代要广泛了好多倍,“目前各党各派团结合作,共赴国难,正

① 张志让:《扩大宪政运动》,《国民公论》第2卷第7号。

② 梁明:《宪政和抗战建国的关系——宪政问题座谈会第二次讨论纪要》,《全民抗战》第94号,1939年10月28日。

③ 梁明:《宪政和抗战建国的关系——宪政问题座谈会第二次讨论纪要》,《全民抗战》第94号,1939年10月28日。

④ 柳湜:《中国宪政运动的几个阶段》,《理论与现实》第3期。

是实行宪政的良好时机”^①，因为“宪政是团结各阶级及其政治上的代表——党派——的工具，是发动广大民众的有力武器”，团结力量与发动民众是任何战争不可缺少的。他表示：“中国的宪政是在对日抗战的过程中得到完成。”同时，民主政体是建设三民主义共和国的基础，如果在抗战全国空前团结这个时机不能建立，只能将其交到民主革命的下一阶段，“恐怕会碰到更多的阻碍，甚至历史的发展再一次地变换它的道路。”^② 曾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的中华职教社参政员江恒源也提出：抗战是“实施宪政最好的时机”，抗战已使民众切身感受到无国家即不能生存，从而认识到个人和国家有密切关系，“这是我们数十年来所要求而不得的民众的飞跃进步”。民众既已动员起来，为国家生存和建设努力了，“实行宪政就是把这许多努力纳入一个共同的轨道去”，因此我们“必须抓紧这个时机使宪政立即实现”。^③ 法政学者、青年党参政员曾琦认为中国“在统一十年，抗战两年之后，始迈步以趋宪政之坦途，入民主之正轨”，现在这种“举国一致对外”的局面，正是实行宪政“千载一时之良机”。^④

以上知识界正反两派之间对“宪政与抗战”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双方虽然有时也受其党派所主张主义的影响，一些论点有一定的阶级局限性，但总起来说，他们都是以自己对于西方宪政和中国国情的理解，对抗战时期能否实行宪政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解剖，是政治制度领域一次追求进步的思想交锋，体现了知识界对国家和社会的政治关怀。

① 赵冬根：《论当前的宪政运动》，《全民抗战》第 89 号。

② 赵冬根：《论宪政》，《理论与现实》第 3 期。

③ 梁明：《宪政和抗战建国的关系——宪政问题座谈会第二次讨论纪要》，《全民抗战》第 94 号，1939 年 10 月 28 日。

④ 香港《大公报》，1940 年 2 月 1 日。

四

综观世界大势,国家政治发展的方向都要取决于其执政党的政治策略及行政执行。知识界处于供政府、政治集团或政党咨询的地位,实际上并不能左右政治局势的发展,但他们能通过自身的理论优势,将先进的政治理念引入中国,并通过广泛、自由的讨论,对其进行本土化的改造和创新,使其冲破国人长期封闭的思想意识壁垒。舆论的力量历来不容小觑,它可以对人的思想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抗战初期关于宪政与抗战的讨论,其意义也在于此。从这次讨论的总体价值来看,实施宪政已经成为全国各界一致的政治要求,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必须循以发展的方向。具体分析,有以下四点:

第一,时机价值。它发起的时机是在抗战进行了两年之后,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团结抗战、民主进步的关键时刻。抗战初期,由于敌我综合国力的差距和国民党的单纯防御方针,日军得以长驱直入,大肆侵占中国领土。抗战两年后,中国人民已经由“团结御侮”的要求,转变为“民主与抗战”的呼声。关注中国命运的知识界深深体察到,不改变国家这种政治现状,几乎不可能救亡图存,于是因抗战全面爆发而沉寂了两年的宪政主张重新提出,“军事决定于政治”的呼声直接推动了第一次宪政运动的开展。宪政运动从国统区延伸到共产党的根据地,声势浩大。知识界在宪政运动之际展开“宪政与抗战”的讨论,无形中把宪政与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陕甘宁边区宪政促进会会长吴玉章把抗战时期的宪政运动称为

“为了加强抗战,帮助政府抗战”的一种“救国运动”^①,就代表了在这个关键时期知识界的一种政治态度的表达。萧敏颂提出,在抗战时期提出实行宪政,“有无限丰富的时代意义”。由于国人文化水平的落后和过去 20 多年宪政的失败,使人们对宪政问题感觉冷漠,提不起兴趣。因此,“以推进社会,启迪民众为己任的文化界人士”,应当抓住这一时机,通过对宪政与抗战的讨论,“促进社会人士对这一问题的注意,提高大家研究的兴趣,并对一般民众进行普遍的宣传教育工作”,“要把宪政运动展开为一个广泛深入的社会运动”。^②

第二,工具价值。国民党提出“三民主义”宪政,共产党力主“新民主主义”宪政,国共两党之间的其他党派倡行“西式自由主义”宪政。国内知识界由于不同的价值观,虽然明显分成几个阵营,但包括无党派人士在内的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从西方宪政是否适合中国抗战环境这一重大问题出发而展开论述,注重学理的分析 and 客观的评论。只有少数国民党文人打着“三民主义”旗号,实际上违背孙中山的学说,而牵强地征引宪政理论进行“抗战中不宜实行宪政”的辩驳。如共产党政治学者平心在署名邵翰齐的文章中,从分析几十年以来中国民族运动与民主运动的关系着眼,得出结论:民主宪政“不但是与民族解放运动并行而不悖的,而且是与后者相辅而行的”。他在承认抗战“始终是全国人民的第一等急务”的前提下,提出“抗战的现实日益创造了民主运动发展的必然条件”,而民主运动和民主宪政也“为抗战增添有力的保证”。^③从

① 方直:《怎样推进宪政运动——宪政问题座谈会第一次座谈主要问题纪要》,《全民抗战》第 91 号,1939 年 10 月 7 日。

② 萧敏颂:《宪政问题与宪政运动》,《国民公论》第 2 卷第 9 号。

③ 邵翰齐:《论民主宪政运动》,《学习半月刊》第 1 卷第 8 期,1940 年 1 月 1 日。

表面来看,不论参与者的党派背景如何,他们都处在同一个讨论平台,展示自己对问题的见解。但实际上,由于阶级社会永远存在不同的阶级意识,这次讨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各党派阐发主义、争取民众、引导政局发展的理论工具。正是在此种意义上,经过宪政与抗战的讨论,大大促进了抗战时期的政治格局得以转变。

第三,拓展价值。这次讨论的主题看起来较为单纯,但实际上涉及了宪政理论的许多方面,如宪政实施的条件、步骤和方法等。许多学者在论述抗战与宪政关系之后,又从其他方面进一步讨论宪政问题。还有一些学者超然于讨论之外,对宪政问题进行了学理论述,如留美博士、曾执教清华大学的陈之迈没有参与直接的讨论,但作为一贯的宪政提倡者,他的论证确有独到之处。此间他在《新经济》连续发表几篇讨论地方自治的文章,其中有一篇专门探讨了宪政与地方自治问题,文章深入论述了地方自治对宪政的重要作用,认为“民主政治的成功须要具备根本的条件,这个条件是人民的自治经验,其取得唯一可靠的方法厥为地方的自治”,“地方自治是民主政治的基础,若果在地方自治的建立上不能收到实际的效果,则宪政便是妄谈,充其量也不过是许多的表面的法律与许多只有招牌而没有内容的机关而已”。他提出研究宪政必须先研究地方自治,把地方自治作为“一片最肥的田”,期待“热心政治者的耕耘”,并相信“它的收获就是宪政的完成,建国理想的实现”。^①显然,陈之迈回避了抗战期间实施宪政与否的问题,而从宪政基础谈起。在宪政与抗战的讨论中,实际上知识界已冲破时间的局限,从多角度、多层次、多方面对宪政进行了深度探索,这在拓展宪政的理论价值上不无意义。

① 陈之迈:《宪政与地方自治——地方政治论之三》,《新经济》第2卷第12期,1939年12月16日。

第四,回归价值。任何理论都要经过历史的验证才能最后得到认同。由于多种政治因素,抗战时期的第一次宪政运动以失败告终,宪政在此间终于没有实施。但是国人的宪政观念并没有因此消失,反而愈加强烈,它为以后风起云涌的民主运动和最终宪政的实现奠定了基础。站在今天的角度,审视60多年前这次关于宪政与抗战的讨论,我们不难发现,正如大多数论者的观点,政治问题确实是抗战其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决定了抗战的前途。实施宪政是政治发展进程中一个必然环节,它体现了不可逆转的政治现代化潮流。在日益发展着的潮流中,任何力量要去转变、去阻遏都是徒劳的,甚至会造成恶果。抗战以后政治局势的变化,正是对此的有力说明。关于宪政与抗战的讨论,作为中国知识界在特殊时期执著于宪政潮流的表征,最终会回归到民主政治理论的框架中,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轨迹。

(作者李翠艳,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李仲明)